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世界历史上的 跨文化贸易

〔美〕菲利普·D·柯丁 著 鲍晨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

〔美〕菲利普·D·柯丁 著 鲍 晨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 / [美] 菲利普·D·柯丁著; 鲍晨译.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2
ISBN 978-7-80713-759-7

I. 世… II. ①菲…②鲍… III. 国际贸易—经济史—世界
IV. F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9308 号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图字: 15-2006-078 号

© Philip D. Curtin 1984

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

First published 1984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 董明庆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19 印张 31 幅图 2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定 价 2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建议图书分类: 历史类

前 言

大多数有关历史的著作倾向于由时间、地点或主题入手，这些分类已为人们所熟悉，而我的研究却有些有违传统。首先，它立足于以历史经济人类学为标志的社会科学中尚未被开发的那片领域。但在历史、经济、人类学这三门学科中，这项研究更关注历史领域。其次，它还立足于“比较世界史”这一较小但具发展势头的领域：“比较”，是因为它概括了与跨文化贸易相关的特定现象，并从中寻找相似点及不同点；“世界”，是因为它力图摆脱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观点，而并非要囊括所有地区的活动；“历史”，是由于它所涉及的是一段相当长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再者，这项研究提出了历史学家应解决的问题：人类社会随时间变迁的方式和原因是什么？而这也涉及到经济学家及人类学家所要研究的那些变迁，当然这一研究也借鉴了他们的理论成果。

运用历史观点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相结合的方法同样需要付出“代价”。本书所记述的并非那些同等重要或更为重要的事例。首先，它不是一部世界贸易史。它关注的是发生在农业革命至商业革命期间某些时间或地点的商业行为。正因为如此，它虽以时间的发展为主轴，其意却并不在囊括所有重要的商人或贸易路线。我筛选例证的原则是看其是否能够体现跨文化贸易的多样性，而非看其是否对承载货物数量有重要意义或是对历史的其他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例如，横跨亚洲的陆上贸易航线，或中俄陆上贸易就极少会被提及，其原因并不在于它们不重要，而是有关这些商业活动的史料记载相对其他时间和地点的记载仍显匮乏。因此，许多文化类型被忽略了，许多时间段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如果有人问及同样的问题，另一位历史学家也许会对例证做另一种选择。

其次，这本书“摒弃”了另一重要的历史方面，即主流文化领域的贸易史。

我们把范围锁定在跨文化贸易同样也付出了“代价”——舍弃了公元1000年后不久中国宋朝国内贸易的兴盛，以及西欧的商业繁荣等重要的历史时期。^{〔1〕}

我们所付出的第三个“代价”是对政治历史及个体事件的有意的忽略。此外，这一研究还打破了按历史事件的顺序性这一传统历史著作的潜规则。

本书与以往不同的另一个特点是采用了一种略显重复的模式。尽管我们寻求的不是诸如历史“法则”之类固定的东西，但研究“特定行为方式最有可能出现在哪种情况下”这一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对模式的研究也就意味着抽象化的必要性。事实上，一切历史资料均是对某特定时间或地点所有可得资料的抽象概括。在此，我所关注的仅是人类活动的“冰山一角”，即人们如何与那些同自己生活方式迥异的人交换物品。

我尝试从“非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研究人类历史，但也遇到了一个重要的难题。任何一位社会学家都困在了自己所处文化与时代所编织的网络中。即使他们试图把研究建立在本族中心论的基础上，但历史不得不使用我们这个时代西方文化共同的社会科学概念解释并用西语进行阐述。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可利用的信息种类及范围限制了历史研究，而且这种信息一直处在变换之中。我所查阅的大部分有价值的文献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

材料的选择同样也受到了语言的限制。我仅仅会用西欧及北美国家的少数普通语言。如果我能很好地阅读俄罗斯、亚美尼亚或中国的文献，这一研究也许在很多领域会更具权威性。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讲，即使我花费了必要的时间来学习所有相关的语言，这也并不意味着我就能完全用它来写东西。

最后，再说一下写作意图。近几十年，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科学知识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学者们的专业性也越发明显。因此，他们更愿意在一种专门的非专业框架下，面对少数但优秀的读者进行研究性写作。我相信这一研究会给历史及社会科学领域带来新的东西，当然也会让受过教育的公众易于理解并有所感触，只有他们知道我成功与否。

感谢许多朋友、同事及学生，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对本书作出的贡献令我无以言表。感谢巴尔迪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艾森豪威尔纪念图书馆馆内贷

〔1〕 其他有关该领域的研究，见费尔南·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人类文明与资本主义》第Ⅱ卷，“商业的车轮”（纽约，1982）；威廉·H·麦克尼尔，《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武力和社会》（芝加哥，1982）；马克·艾尔文，《中国往昔的模式》（斯坦福1973）；塔班·雷坎德胡利和伊凡·哈比卜（编），《剑桥印度经济史》（2卷）（剑桥，1982）

款部细心的帮助。此外，特别感谢派特瑞希亚·罗麦罗·柯丁、理查德·海利、艾伦·伊萨克曼、保尔·拉夫乔伊、威廉·H·尼克内尔、安东尼·雷德，约翰·F·理查德，威廉·罗伊以及A·J·R·罗斯－福，感谢他们拨冗审阅我的手稿并提出了具体的批评意见。毫无疑问，我本人对本书内容负责，特别是“错误地”坚持引用那些事例，尽管他们已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同样感谢纽约卡耐基公司(通过威斯康星大学比较世界史计划)及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在这部著作准备期间所提供的资金支持。

菲利普·D·柯丁

目 录

前言 / 1

一 贸易离散社群与跨文化贸易 / 1

贸易离散社群 / 1

生命历程：跨越历史的贸易离散社群 / 3

商人及其寄主 / 4

商人聚居区及其相互关系 / 6

文化交融 / 10

跨文化贸易的交替模式 / 11

二 非洲：贸易动机、竞争类型 / 14

贸易动机 / 15

盐、铁和鱼 / 16

骆驼、枣椰子和跨撒哈拉贸易 / 19

从沙漠到森林 / 23

通向热带非洲海岸的贸易 / 24

转口市场 / 27

肩并肩的竞争 / 30

东非：贸易网络的演变 / 31

三 非洲：商人与贸易社区 / 37

保护费、强迫与国家 / 40

从歃血为盟到缔结条约 / 44

宗教的排外和包容功能 / 47

地主、掮客与商队首领 / 51

沿海市场与欧洲商人 / 55

四 远古贸易 / 59

- 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 / 60
- 深入安纳托利亚的亚述商人 / 66
- 埃及和地中海东部的古代贸易 / 69
- 希腊人与腓尼基人 / 73
- 哥伦布到达前的美洲贸易 / 79
- 早期交换形式的一种连续? / 85

五 新兴的贸易中轴线：从地中海到中国（约公元前 200 年—公元 1000 年） / 87

- 早期的中国贸易与跨越中亚的开始 / 88
- 印度洋西部的海上贸易 / 93
- 对东南亚的早期贸易 / 97
- 罗马覆灭后的地中海：全新的世界帝国 / 99
- 印度洋贸易和伊斯兰教的兴起 / 103

六 东部海域的亚洲贸易（1000—1500） / 105

- 宋朝早期的“经济奇迹” / 105
- 穆斯林地中海的世界贸易（970—1250） / 106
- 贸易方式：地中海基督徒（1000—1500） / 111
- 亚洲贸易的重新调整（1250—1500） / 115
- 东部海域的贸易方式 / 122

七 欧洲人涉足亚洲海上贸易 / 130

- 葡萄牙商栈帝国 / 131
- 16 世纪亚洲商人的对策 / 138
- 北欧人与葡萄牙人的竞争 / 142
- 实践中的联合东印度公司 / 145
- 英国东印度公司 / 147

八 布吉人、印度商人和中国人：大公司时代的亚洲商人 / 151

- 南苏拉威西岛的贸易离散社群 / 152
- 中国海域的贸易 / 159
- 叛逆者和印度商人 / 164
- 城市网络 / 168

九 17 世纪的陆上贸易：往来于欧洲和东亚间的亚美尼亚运送人 / 170

早期商业中的亚美尼亚人 / 173

16 世纪前的亚美尼亚离散社群 / 176

亚美尼亚人与沙法维波斯 / 177

从波斯穿越俄国的陆上贸易 / 179

亚美尼亚社区的内部关系 / 183

亚美尼亚离散社区 / 188

十 北美皮革贸易 / 197

北美环境：流行病和文化 / 197

北美环境：地理与海洋通道策略 / 203

圣劳伦斯河上的第一阶段（1600—1649） / 208

哈得孙湾的开放 / 210

皮革贸易和协议售价 / 214

十一 贸易离散社群的衰落 / 218

工业主义和易变的平衡 / 218

工业时代的遥远映像：非洲的二级帝国 / 222

非正式帝国和全新的商栈：新加坡 / 227

香港和条约口岸 / 229

领事代表 / 232

边缘西方化 / 233

欧洲统治的工具 / 237

参考书目 / 241

索 引 / 261

一 贸易离散社群与跨文化贸易

跨文化领域的贸易与交易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抛开军事征服不可估量但略显消极的影响不说，它可能是引起历史变迁的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相应地，外界刺激也成了艺术、科学以及技术领域变化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单一来源。也许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人类群体都无法独立创造其文化及科技遗产。以本书作为一个简单的例子。英语语系源于随着德国移民迁入西欧的语系中的一种，融合了拉丁语成分（最初为南部的帝国征服者所强制使用），后又加上了其他外来语。字母源于腓尼基人，页码源于阿拉伯人，实际上，欧洲人从阿拉伯人学到的数字的真正来源是印度人最先发明的位置记数法。几年前，如果一册类似本书的书采用活字印刷的方式，那就会有中国的烙印。

另一方面，跨文化贸易与交流也引发了特殊的问题。根据定义，陌生人是指拥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彼此间的行为方式难以预料，而这就具备了危险的可能性。交流本身就有困难，即使出现了一种合适的媒介（如一种通用的第二语言），沟通也不会畅然无阻。纵然陌生人双方不采取敌对态度，他们也不会完全像邻居或亲友那样相互信任。这些在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意味着双方贸易通常会在特殊机构安排下进行，从而保障贸易双方的安全。

贸易离散社群

跨文化贸易最初阶段的状况已无从查考，任何相关的历史再造也于事无补。甚至拥有现在习俗的人们使用最为落后的技术——就像石器时代打猎或聚居人群的生活方式直到一个世纪前才被外界了解一样——也未必能使人们真正地了解遥远的过去。但我们可以推断，跨文化贸易最早出现在偶遇的猎

人队伍之间，或者贸易伴随着武装冲突而出现。我们还可以推测，不同社群间的贸易最早发生在边境附近。语言学证据表明，这类贸易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后来，赫尔墨斯成为贸易之神以及划分两座城市的界碑之神。^[1]但到公元前8世纪，这种希腊城市间的早期边境市场便不复存在了。如果与此类似的贸易机构同样出现在古代世界的其他角落，它们也会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是由于商人期望与潜在客户进行最大可能的接触交流的缘故，早期的城市市场更易出现在城市中心，而非郊区。

不管跨文化贸易的初始阶段采取何种形式，贸易聚落成为城市生活出现后最为普遍的机构形式。“商业专家们”离开自己的故乡，以移民的身份定居在其他城镇——通常不是一个边缘城镇，而是一个在寄居社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城镇。那些外来的商人在那里安顿下来，学习语言，了解习俗，并掌握寄居社区的商业运作方式。然后，他们可以作为跨文化经纪人，帮助并鼓励当地人与不远千里来自故乡的人进行贸易往来。此时，迁移并安顿下来的商人与那些仍要继续游离的商人之间的差异开始显现出来。本来开始是单一的聚落，不久便变得愈发复杂。那些本想在国外开辟一个贸易区域的商人开始在寄居城镇建立一系列贸易区。结果，相互联系的商业团体形成了贸易网络，或称为贸易离散社群（diaspora）——这个词源于希腊语，意为分散，用于播种谷物。^[2]

贸易团体中的商人生活在相关联的网络的外乡人之中，人们可在各大洲找到他们的踪迹，并能往回追溯至城市生活的开端。正如我们所见，贸易团体虽然是所有人类组织中历时较长、分布最广者之一，但也只是随着农业出现而兴起，又因工业时代的到来而消失。尽管有关他们工作方式的部分最有力证据来自于17—19世纪的非洲，但其他例证也同样丰富多样，耳熟能详。例如，自黎凡特（或爱琴海岸）向西蔓延的腓尼基和希腊贸易城，抑或约两千年后，来自科隆的商人们沿莱茵河岸的贸易路线定居下来，而后向东迁徙至

[1] 诺曼·O·布朗，《小偷赫尔墨斯：神化的发展》，第2版（纽约，1969），38—46页；简·克里斯托弗·阿诺，“交换的开端：市场上的投机买卖”，《基本历史评论》，21：99—118（1979），101—103页。

[2] “贸易离散社群”一词源自人类学家阿伯纳·科恩，他在《贸易离散社群组织的文化策略》中把这一词汇定义为：“一个社会性上相互依赖，但在空间上离散的社群所构成的民族。”（收录于克洛德·梅拉索编《西非本土贸易及市场的发展》（伦敦，1971），267页）。其他人类学家则偏好使用“贸易网络”，认为其更为精确。详见罗伊德·A·佛勒斯编《移民与联盟》（海牙，1967）；卡尔·A·耶姆波特，“外国商人与统治精英：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与东非的印度人”，《民族团体》，3：173—198（1981）。

北海及波罗的海沿岸,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由独立贸易城市组成的汉萨同盟。

贸易离散社群或于陆地迁居,或沿岛间水路转移。其中人们最为熟知的便是由法国—加拿大非法毛皮贩子(coueurs de bois,早期在加拿大边界流窜)开辟的北美五大湖路线,为了同印第安人皮革生意,他们到达了密西西比河及更远的地区。考古学证据表明,中东地区可能出现的贸易离散社群可追溯至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000年刻有形行文字的泥板证实了这一点,它详细记录了当时小亚细亚卡帕多西亚的亚述人贸易聚落的商业活动。

这些网络的构成方式各有不同。有的组成颇为随意——各个聚落仅依靠其共有文化的稳定性而连接在一起。有的则颇为正式,例如17、18世纪的大欧洲贸易公司,它们由欧洲国家特许成立,享有一定的垄断权,可进行管理及贸易,也可使用其自有的军事和海军力量。

生命历程：跨越历史的贸易离散社群

在有关历史上人们如何进行跨文化贸易的各种可被证实的假说中,存在一个比较有名的命题,即贸易离散社群趋向于使自己脱离商业贸易。尽管贸易离散社群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的文化需要调和、沟通,但数百年、甚至数十年的调和在减少文化差异的同时,也削弱了对跨文化经纪人的需求。起先,远距离贸易需要一个同族人,至少也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同乡作为其经纪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经纪人应运而生。从长远角度看,西方商业文化在跨国公司时代成为了世界上最为普遍的商业文化。

然而,在这一最早且最为宽泛的命题下,贸易离散社群个体使自己脱离商业贸易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有的背井离乡,远离寄居社会,进而从事原来的角色。这一类型以欧洲中世纪迅速发展的贸易离散社群最为典型。16世纪末,外国正式贸易聚落逐渐消退。例如,汉萨同盟放弃了其在伦敦的特殊贸易商馆——“钢铁院子”^{〔1〕}。加来,这一位于法国北部的英国6世纪中叶前的属地,在英国向欧洲大陆分销原生羊毛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后来

〔1〕汉萨商人在伦敦的商馆称为“钢铁院子(Steelyard),周围设置围墙,自成一境,有他们自己的堆栈、计量所、办公处及住宅等,俨然是一个特区。这一商馆于1282年经英王特许设置,允许汉萨商人开采锡矿,货物免税通行。这种优惠完全是片面的,因为汉萨商人并未给英国商人互惠待遇。英国商人对此一直心怀不满,要求英王取消这种特权,但“钢铁院子”一直拖到1598年才闭歇。——译注

又重归法国管辖。英国商人冒险家公司是英国羊毛织物出口的主要输出渠道。其总部最初设在安特卫普，而不是英格兰，但是后来，随着英国布料通过众多大陆城市向外出口，安特卫普 16 世纪 50 年代便丧失了其特殊地位。实际上，“工厂制”的公共机构——为外国商人或代理商而半公开设立的单独区域，最初发展自中世纪的佛兰德斯——16 世纪逐渐在欧洲消失，同时它作为一种欧洲与亚、非洲进行贸易的普遍方式而再次出现。^{〔1〕}在欧洲，通过在其他城市建立洋行，并雇用本国代理来进行国际贸易的方式已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对当地委托代理的更多依赖。例如，16 世纪初，都铎伦敦拥有大批定居在此的意大利商人，然而，随着盎格鲁—意大利贸易数量的不断增加，这批商人的数量却日益减少。当时，雇用委托代理的费用确实要便宜得多。^{〔2〕}

但是，即使那些其他的贸易离散社群不再从事远距离贸易，他们还是以文化的少数族裔的形式留下了遗产。位于东南亚的华人聚落的起源要追溯到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开始成型的贸易离散社群，虽然它们后来被合同工人及其他种类的移民所取代。到了 20 世纪，尽管这些华人保留着大部分商业传统，并维持着自己在批发、零售业的统治地位，却再也不是管理着一个贸易离散社群。这仅是例证之一。在贸易离散社群中遗留的文化少数族裔，可以利用其自身的贸易取向及其社区的稳定性，从而确立对寄居社会商业生活的部分垄断。

位于坦桑尼亚、肯尼亚及乌干达的印度贸易社区的情况与此类似。虽然它们在商业领域的重要性直到 19 世纪才逐步显现出来，但它们在零售业的统治地位一直持续到这三个殖民地独立。大部分乌干达的印度人被逐出，但是那些依旧居住在坦桑尼亚，特别是肯尼亚的印度人，如同大约一个世纪前东南亚的华人一样，已从零售业转移到了其他的经济领域。

商人及其寄主

在贸易离散社群的比较研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量是存在于贸易社区与寄居社会之间的多种可能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寄居社会的统治者认为，商人

〔1〕 克里斯托弗·格莱曼，“1500—1750 年的欧洲贸易”，收录于卡尔洛·M·希伯拉编《方坦那欧洲经济史》，6 卷（伦敦，1974），2：514。

〔2〕 M·E·布莱切尔，“都铎伦敦早期的意大利商人组织与商业关系”，《欧洲经济史杂志》，7：5—32（1978），6，29 页。

是最为低等的阶层，可任意对其进行压榨和掠夺，允许他们存在只是因为他们是利用价值。尽管各地情况各有不同，但中世纪欧洲犹太人的遭遇常常如此。其他地方的商人成功地成立了自己的自主自治社团，对一切政治斗争均坚持自觉的和平主义和中立立场。17、18世纪西非的加汉克（Jahaanke）便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这一范围内做到极致的是始自16世纪并贯穿整个18世纪的设于亚洲的欧洲商栈帝国。它们不但试图建立其军事控制下的贸易区域，还企图强力控制亚洲贸易并按他们的意愿变更贸易条款。到18世纪末，他们对武力的有效使用得到了“回报”：至少位于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及位于爪哇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已不再是军事化的贸易离散社群，而成为了真正的领土帝国——它们分别成为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核心以及荷兰在东印度地区的中心。

不论商人与寄主间谁更占优势，它们间的关系总归是不对等的。商人是单一经济活动中的专家，而寄居社会是一个社会整体，包含着各种职业、阶层以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政治派别。

综观众多社会，商人这一职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特殊性。在工业社会前，职业商人充其量只是少数群体，大多数人都不得不以耕地为生。既然商人无论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创造经济价值颇丰的阶级，质疑之声逐渐兴起（其中不仅包括耕种者，还有那些行使诸如政治制度和向上帝祈祷德的必要功能的人们的质疑）。这种情绪的出现理所当然地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不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商业都是一个远低于其他行业的行业。作为一个阶层，如果商人在处于社会低层的同时拥有大量财富，那么他们的不受欢迎程度将更为深化。无论怎样，从事远距离贸易的商人总是能够获得明显的非同寻常的机会，以巨大的风险为代价牟取巨额的回报。

如果人们对商人持有怀疑态度，他们就更加无法信任外乡人，尽管一些社会确实支持外乡人。即便希腊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容小觑，古希腊的那些业内人士普遍持有这样的观点：如果商人在那里被看做是一项不雅的职业，那就最好把它留给外乡人去从事。以此类推，中世纪的基督欧洲人就更愿意放债给犹太人。总之，远距离贸易需要某些人离开故乡成为外乡人。同样地，外乡人的嫉妒和猜疑极易深化商人的嫉妒和猜疑。

诺曼·O·布朗根据大量文学记录，探究了希神赫尔墨斯，进而总结出古老遗物所蕴含的某些关联。^[1] 赫尔墨斯起先是界碑之神，后逐渐成为商人

[1] 布朗，《小偷赫尔姆斯》，特别见82-87页。同样见阿诺，“交换的开端”，100-110。

的守护神，专门穿越边境的神。而且，他并不如其他神那样受人爱戴——因为他不仅是信使，还是一个骗子和小偷，是希腊社会的少数人所信奉崇拜的一个边缘化的神。柏拉图厌恶贸易，他认为贸易如同其他追求利益的职业一样，与人类美好的品质是水火难容的。

在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对思维范畴的猜疑中积极的一面重现了一个主题——商人职业本质上的罪恶注定他们在救赎的道路上困难重重。从消极的方面讲，许多商人把拥有“小偷的大拇指”作为法宝，而圣诞老人也相应地成了小偷和商人的守护神。

商人聚居区及其相互关系

贸易离散社群内部个体间的关系作为第二个重要的变量，其变化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同一文化属系内位置分散的聚落间没有任何正式联系。它们仅凭借共有的宗教、语言及血缘等情感因素休戚相关地联结在一起。有的贸易离散社群的情况则极其不同，它们自创始之初就是一个政治实体，每一个实体都受统一的掌控。印度政厅（Estado da India）——16世纪葡萄牙在亚洲的帝国——就是一个例子。其果阿总督统治着一些次要的基地，如东非的莫桑比克、今天新加坡附近的马六甲以及中国南部的澳门。

一定程度上来说，各政治实体间的关系随某一个实体内部商人与其寄居社会间的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某地寄居社会占主导地位，那么当地的商人们就不可能同其他商人社区发展正式的政治关系。同样，如果某地商人们控制一个聚居区及周边地区，那么他们至少就有可能——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与其他实力相当的聚居区进行政治往来。

然而，其他的变化也是可能的。即使某社群内政治联系薄弱，其间也可蕴含深厚的情感关联。尽管希腊贸易聚居区更期望发展成为大都市——文学上称之为“母亲城”——这对于能否延续其宗教及政治联系至关重要，但它们却有时发展成为独立的城邦。在某些情况下，城邦的发源地可能会从体系中消失。腓尼基人最初的故乡——黎凡特贸易城（如提尔和西顿）便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这些城市起先在国外征服中沦陷。公元前4世纪后，它们又被由亚历山大大帝的后继者创立的希腊世界所吞并。尽管迦太基及时取代了原母亲城的位置，但地中海西部的腓尼基人自己的殖民地被留了下来。

由德国北部城市组成的汉萨同盟勾画了贸易离散社群内个体间的另一种

关系形式。汉萨同盟最初由科隆商人组建,12、13世纪开始向外扩张——先是到达日德兰半岛西部的不来梅和汉堡,后又向东远至吕贝克,以及波罗的海南岸的一连串港口城市。14世纪至15世纪初期,无论是从所积聚的财富,还是就影响力来说,同盟城市在当时都达到了巅峰:那时,他们的贸易范围西至伦敦和布鲁日,北达挪威的贝尔根,东及俄罗斯内陆城市诺夫哥罗德。即便整个同盟经济实力雄厚,但各个城市却是相对独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科隆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吕贝克坐上了汉萨城市同盟的头把交椅,但是无论从任何有效的政治角度来看,它都算不上是一个中心。汉萨同盟只是一个由独立城市组成的联盟,而非自治州。它们参与战争,但每场战争都由为此目的而创建的同盟参战,同盟完全通过非正式手段迫使每一城市参加。

与这种社群相对立的一种组织形式,是东部海域各个特权欧洲贸易公司牢牢控制的贸易离散社群。相比较于在独立城市的基础上进行运作的数千家独立的汉萨公司,这一形式中的欧洲大都市不仅是贸易公司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其管理中心。

与这一范围相关的各种可能性仍然晦涩难懂。贸易离散社群沿线的聚居区,或为单个城市,或为城市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们总体上都对城市管理中的各种关系有所了解。城市理论认为,城市不仅仅人口密集(尽管这是事实),而且还是从事各项工作的人们的集中地,其城市特征更多的来源于活动的多样性,而非因为人口众多。^[1]

在人类物质生活的早期,狩猎、集聚的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向外迁移。即使是早期农业,人们出于耕种的需要也不得不过着以小村庄或部落为中心的生活。尽管城市更具专业化的功能无论何地都可实现,但它们却更趋于出现在一个中心地区。或许,一开始出现的一座供奉神灵的庙宇吸引了大批的奉教者;随后,商人及零售商闻风而至;再后,庙宇、奉教者以及商人又为政治统治者、法庭以及收税人的出现提供了前提。上述人物出现的次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各种专业化功能趋于集中的现象出现,促使了城市聚落的形成,各种事物孕育其中。各类事物的产生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由城市组成的整个社会的生活延续。然而,一座城市与内地区域的关系是不均衡的。城市往往自己具有最优秀、最专业化的功能,而乡村和更小地方的功能则少得

[1] 埃瑞克·兰帕德,“从历史角度看城市化”,收录于P·M·豪瑟及利奥·F·施奈尔合编《城市化研究》(纽约,1965)。

多，且多半大同小异，例如饲养牲畜、耕种庄稼。

即使城市间相互比较，其多功能化程度也参差不齐。城市间的关系同个体城市与内地区域的关系颇为相似。正如小型城市比农村更为先进，多功能化程度高的城市显然更具优势。多职能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自身便可起到对整个社会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无论一个国家有无政治轮廓，各城市都逐渐以多职能化的层次构建了各自的城市网络。

在这种基本模式下，模型看似简单，但它却极其重要地隐含了穿越时空的各城市间正在变化着的关系，而这也可延伸到贸易离散社群内聚居区间的关系。这种模型显示了两种理论假设：其一，多功能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对程度较高城市的功能依附也可以成为其政治经济依附的基础；其二，一个社会的技术精通程度越高，其多功能化范围也就越广。因此，时间的推移在为人类社会带来复杂科技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阶层中低层对高层的潜在依附性。

“依附”这一术语的使用与近期理论及经验主义研究的主体、所谓的“依附理论”可能存在关联。安德烈·贡德·弗兰克^[1]、阿吉瑞·伊曼纽尔及伊曼纽尔·沃勒斯坦^[2]等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3]然而，这种理论学派的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近几个世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学者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关注着在这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里，“中心”与“外围”的关系问题。针对城市间的关系这一命题，我的假设全然不同。城市间的关系既不受设立在特定编年时代的某特定经济体系的左右，也不能对历史变化起任何主导作用。它们只是影响历史进程中的众多力量之一。这些关系大多来源于一些地理概念，著名的如松散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 theory），或经济学中的区位理论

[1]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其代表作《白银资本》获1999年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译注

[2]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长期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社会学系，现为美国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沃勒斯坦的重要著作包括《现代世界体系》（3卷）、《自由主义以后》、《历史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明》、《乌托邦幻想，还是21世纪的历史选择》、《沃勒斯坦精粹》、《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等。——译注

[3] 依附学派的文献数量庞大、内容广泛。若作参考，可见查尔斯·K·威尔伯编辑的《发达与不发达的政治经济》，第二版（纽约，1979）；阿吉瑞·伊曼纽尔，《不平等交换：贸易帝国主义研究》（纽约，197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纽约，1974），多卷本。